

在中国,“养儿防老”、“多子多福”的观念几千年来深入人心。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间内,人口与一个国家的劳动力、兵力和综合国力密不可分,各朝代生育政策的主调都是鼓励多生。到了民国,无论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,还是美国节制生育运动领袖桑格尔夫人的访华,都启发中国人从更加科学理性的角度,思考生育和民族进步的关系。“中国人应当少生孩子”的观念已经萌芽破土,甚至在社会上引起过热议。而南京人汪士铎就是第一个在中国倡导计划生育的人。

清末南京人汪士铎最早提出计划生育

“人口屠夫”惊世骇俗,主张早婚要杀头

鸦片战争之前,社会的相对稳定和“摊丁入亩”的赋税政策,使得中国人口出现了大幅增长。康熙三十九年到乾隆五十九年,中国人口由1.5亿增加到3.13亿,到道光三十年已高达4.3亿。如此严峻的人地之争,让统治者有所察觉。

1840年后,中国外患内乱频发。“人多”与“世乱”往往相联系,于是有人提出要减少人口。被称为“计划生育第一人”的汪士铎,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。汪士铎是南京人,1859年曾入翰林翼幕,受过曾国藩的重用,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积极出谋划策。1855年到1856年间的《乙丙日记》,是他被太平军俘获期间所写,是主要议论中国人口问题的一部著作。

汪士铎在书中针对人口问题,提出了令人瞠目的建议:一是实施晚婚,男子“定三十而娶”,女子“二十五而嫁”,“违者斩决”。当时中国农村中大多数人十五六岁就已婚嫁,他主张早婚就要杀头,无疑骇人听闻。二是提倡限制婚配和药物避孕,一家只许有一子或一女,最多两子,两女是不被准许的。对已有孩子的人家,要广施“不生育之药方”。明清时期,江浙一带堕胎药的生产销售已十分商业化了。最触目惊心的是他对女人的仇视——汪士铎推广溺婴,尤其是女婴。对于违法乱纪的囚徒,汪士铎主张用刑峻法大量诛杀之。

如此酷烈的提议,给汪士铎带来了“人口屠夫”的骂名。其实汪士铎的个人生活相当悲惨,他前后娶过两任妻子,总有四子四女,其中四子一女出生不久即夭折,可见当时婴儿死亡率之高。而历经太平军之难,最后仅有一个女儿活了下来。大约考虑到自己的主张激烈极端,难为社会所容,汪士铎生前虽自认《乙丙日记》是最珍贵的文字,但始终秘不示人。他的遗稿于1935年被史学家邓之诚所得,整理出版后,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。汪士铎以对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的深入研究而被尊为“中国的马尔萨斯”,同时也因其观点怪诞获得“近世南京名士中一大怪物”这样的称谓。

虽然清代统治者意识到人口问题带来的沉重包袱,但节制生育的政策并未被推行。清末十年修律,沈家本主持修订的《大清刑律草案》中,视溺婴为杀人罪,并全面禁止堕胎。不过,清王朝旋即覆灭,由此修订公布的《大清新刑律》根本未及实施。

张竞生提倡避孕节育,被骂“卖春博士”

马尔萨斯的思想大约在1880年,随西方经济学著作《富国策》的翻译而被引入中国。随后严复在《天演论》的按语中,详细地介绍了马尔萨斯的学说,马尔萨斯的观点借《天演论》所刮起的进化之风,得到了学界许多肯定的反响。梁启超、陈长衡等学者,纷纷发表文章,支持马尔



汪士铎 资料图片

萨斯的观点。

其中一位学者张竞生,是后来屡屡被提及的另类人物。他是同盟会会员,中华民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,最早在中国提出“性教育”的人。1920年,张竞生从法国获博士学位,学成归国,受聘为广东省立金山中学校长。按例他要到广州领取校长任命书,于是得见时任广东省长兼督军的陈炯明,向陈炯明当面递交条陈。张竞生力主节育,他有感中国人漫无节制地多生人口,主张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,违反的就要受处罚,他甚至连节育方法和节育器具都写得很清楚。陈炯明看后大为不快,他自己妻妾成群,子女众多,隐约觉得受了讽刺,对推荐张的财政厅长邹鲁骂道:“这是一位神经病!”

经人劝解,张竞生还是当上了金山中学校长。不过仅仅几个月后,他大刀阔斧的改革,得罪了一些人。因张在《汕头报》写文章提倡避孕节育,有人散布谣言,冠他以“卖春博士”称号,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。张竞生心灰意冷,一度要跳海自杀。后来,蔡元培聘请他去北大哲学系当了教授。1922年桑格尔夫人访华,张竞生忿忿不平:“我于三年前尝极力提倡生育限制法,大受社会的咒骂。不一年间美国山格夫人(桑格尔夫人)来华提倡同一的论调,前时骂我的报纸者竟一变而为欢迎山格夫人的主张了。”张竞生认为,这仅仅“因为伊是美国的女子,我是中国的男人”。

美国节育第一人到访中国

张竞生提到的桑格尔夫人,1879年出生于美国纽约,性格豪爽,喜欢探索。有关生育最早的刺激来自她的母亲,桑格尔夫人的母亲一共生了十一个孩子,因无休止的生育而导致身体极度衰弱,年仅四十岁就撒手人寰。桑格尔夫人长大后在贫困的纽约下东区当了一名护士,亲眼目睹许多妇女无法掌控生育而遭受巨大痛苦。她坚信女性若想掌握自己的命运,节制生育是首要任务。

这位美国生育节制运动的创始人、世界计划生育运动的领袖,曾于1922年和1936年两次来华宣传。1922年,她受蒋梦麟、陈达、蔡元培、胡适等人的邀请,来到北京。桑格尔夫人在北大和上海做讲演,报刊竞相报道,当时在广大公众下公开讨论各种避孕措施,在保守风气笼罩的中国社会,是一件破天荒的举动。

当然也有人表示不满。1936《中央日报》上就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,写信的女士说自己的许多朋友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,“在她们怀孕两三个月时,去请求医生把胎儿钳去,每次手术费至少要两三百元。有的人甚至有孕无孕,每两个月必到医生那里刮刮子宫……不消说,她们都是年轻漂亮的太太,社会上的摩登人物,虽然结婚了但是怕生孩子……她们只愿自己享受自由,哪管什么民族问题。”

当时一批知识分子则把生育节制当作“社会的福音”,视为社会改良的良策。1925年,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在清华附近的景山东大街开办的“诊查所”,大概是中国最早的节育诊所。1923年至1937年,是中国节制生育运动发展的黄金时期,只是自发于民间,而没有进入官方的视野。

国民政府最后公布的人口是四亿六千万

1937年,“七七事变”爆发,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。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前并无严格意义上的人口政策,国民政府在战时制定的人口政策中,很大程度采纳了生育节制的主张,这标志着节育运动由民间走向官方。

孙中山本人对待人口问题的态度,前后差距颇大。他最早在1894年《上李鸿章书》中提出:“今日之中国大有人满之患矣,其势岌岌不可终日。”后来他对中国人口数量并没有表现出忧虑,反而还很自豪,于1919年曾说:“我国地大物博与美国同……劳力之人工,我即四倍于美国。”从1924年开始,孙中山的想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一直到逝世前,他都在担忧中国人口数量的减少。

对于孙中山的思想,拥护和反对两派均有,但无疑在国民党内影响很大。抗战前只做过两次户口调查,但皆非全面人口普查所得,准确性大打折扣。抗战中期,大量壮丁损失,关于人口问题的稿件和讲题一天多似一天。在这种氛围中,南京国民政府出于战后复员建设的考虑,于1941年在行政院设立社会部,当年秋天,社会部组织成立了一个“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”。

1941年国民党八届八中全会,通过了薛笃弼等十七名委员提交的提案,提案中认同当时中国人口死亡率约为千分之三十,产妇死亡率约为千分之十五,中国人平均寿命仅为三十岁。提案提倡要通过卫生建设改善国民的健康。1942年至1943年间,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开会讨论,初步讨论形成了人口政策的纲领草案。最初草案提交中执委审议时,由于戴季陶对有关“性教育”的内容表示反对而未通过。

接着便是更多次的开会争议与修改。内政部督促各省进行户口清查,并根据旧有资料,汇编成全国的户口统计数据。结果于1947年7月公布,全国人口数为461006285人,这是国民政府最后一次公布人口数字。

黄薇《文史参考》

孙荃:郁达夫无法消受的痴情

他俩,真的是门不当户不对,一个是洋气逼人的东洋学子,一个是裹小脚扎大辫的乡下姑娘,一个家境破落,一个娇生惯养,这注定是场有始无终的流水姻缘。

她叫孙荃,那年,她22岁,在当时已经是个“剩女”了。父母急得直抓狂,上门提亲的踏破了门槛,可姑娘一个也不中意。直到有一天,一位远房亲戚上门说亲,县城里已故中医郁士贤家的三公子郁文正在东洋留学,年逾20尚未婚配,可与孙小姐结为百年之好。她听了,心一颤,不顾父亲嫌弃郁家无田无产,竟欣然同意。



郁达夫、孙荃与孩子 资料图片

22岁“剩女”决定再等郁达夫五年

第一次踏进郁家是在那年初秋,郁家老太太对未过门的媳妇不放心,想亲自见个面吃颗定心丸,于是邀请她去家里玩,她一身小姐打扮,大大方方地来到郁家。跟自家朱楼高墙相比,郁家的三间临水小木楼显得很寒酸。但这有什么要紧?自己的未婚夫可是有出息的人,他叫郁文,字达夫,是当地的神童,7岁入学,9岁便能赋诗,17岁去日本留学至今未归。

郁家老太太一见到她便喜笑颜开,孙荃说话和气,没有千金小姐架子,长相也不错,一双大眼睛机灵聪敏。老太太十分激动,立刻叫人修书,召回远在东洋的小儿子。

彼时,郁达夫正在为追日本女子不得而感到郁闷不快,听闻家中已为他定下亲事,新娘还是知书达理的佳人,不禁兴奋起来,他很快乘上回国的客船,恨不能立刻得见佳人。从收到书信到回到富阳老家,已是第二年7月,他不知道,孙荃为了这一天,不知流了多少泪。

他见到她,目光如春日小雨,忽东忽西,看得她发毛,最后停留在她裹过的小脚上,她机敏地意识到,他是新派人,不喜欢小脚,忙解释,又拿出自己抨击裹小脚陋习的文章给他看,证明自己也是被迫害的“苦命人”。他好歹放过了这一着,待她还可以,但却不提婚姻之约。家人催得急了,便说自己尚无养家的能力,给长兄写信道“母老矣,不能为弟养妻养子也”。她竟也不介意,反为他的孝顺感动,一颗芳心由此被系得更牢。

郁达夫要孙荃等他,他说“此身未许亲老,请守清官再五年。”五年,青春有几个五年,当时她已是22岁的大龄姑娘了,再等五年,在那个年月,有几个人等得起?

孙荃的才情打动了郁达夫

聪明如她,不会看不穿郁达夫的心思,打第一次见面,她就感受到了,郁达夫嫌弃她土,不洋气,缺乏浪漫气质,不是他理想中的佳偶。但父母之命不好违,她的聪慧贤淑让他无话可说,他就拖,想让她自动放弃。

郁达夫没想到,孙荃竟答应了他,不仅答应,还甘之如飴,说“活是郁家的人,死是郁家的鬼”,不仅常到郁家服侍郁母和祖母,还担起了与他通信的代笔责任。久而久之,他在心灵深处,便对她产生了好感。

说到底,真正打动郁达夫的还是她的才华,郁达夫到日本后不久,收到她代笔书写的家书,里面夹诗一首:“风动珠帘夜月明,阶前衰草可怜生。幽兰不共群芳去,识我深潭万里情。”郁达夫万没料到,一个乡下女子竟有如此才情,不禁大为怜惜之意,他在日记中说:“孙潜婉(孙荃又名潜婉)氏手书,文字清简,已能压倒前清老秀才矣。”他还将这诗署上自己的名字拿去发表,竟然无人识破。

比起胡适、鲁迅和陈独秀,郁达夫真的很幸运,同样是包办婚姻,他却得到了一位温良聪慧的佳人。

郁达夫的心里,肯定是喜不自禁的。从他孙荃的诗词唱和可以看出来,1918年初春,孙荃赠诗郁达夫:独在异乡为异客,风霜牢落有谁亲?纵然欲诉心中事,其奈阳光少故人。郁达夫步其原韵和道:谪尽天涯飘泊趣,寒灯永夜独相亲。看来要在他乡老,落落中原几故人。

这一唱一和的,感情如同微风春风一样,一点点地来了,且越织越密,到了这时候,郁达夫也十分愿意娶孙荃过门了,在双方家长催促下,1920年,两人高高兴兴地结婚了。

六年的婚姻让她回味一生

婚礼办得十分简单,一顶小轿将新娘抬进郁家小院就完事,完全是按郁达夫的心意办的。婚后两人度过了一段短暂的甜蜜时光,之后,郁达夫仍回到日本继续学业。直到1922年,才完成学业回家谋生,郁达夫在广州、上海、杭州等地来回奔波,照顾一家老小的重任由孙荃一肩挑。有一回,为了给郁达夫凑出行路费,孙荃毫不犹豫地当掉自己的衣服。

郁达夫专心事业,经常忙到很晚才回家吃饭,有一天郁达夫到半夜才回家,进门一看,孩子们都睡了,孙荃一人守着饭菜在等他。郁达夫感动地说:“我不回家,你就不能先吃呀?”孙荃热着饭菜,说:“也奇了,你不回来,我想不起来吃饭,不和你同桌吃饭,我一个人也吃不下饭。”

在郁达夫的圈子里,孙荃是名副其实的贤妻,做得一手好菜,郁达夫常常将创造社的一帮人请到家里来吃饭,让孙荃露一手。

这样的幸福甜蜜持续了六年,婚姻的第七年,一个叫王映霞的名门美女斩断了孙荃的婚姻。当王映霞惊艳地出现在家中时,孙荃心里凉了。1927年6月5日,郁达夫与王映霞在上海订婚时,孙荃正在北平某产房里痛苦地呻吟着,为他生第三个孩子。订婚那天,郁达夫喜气洋洋,身上穿的那件羊皮袍子,正是孙荃从北平寄来的。

事情至此,孙荃知道无法挽回郁达夫的心,她绝望了,毅然转身,此生视他为亲人,不提恩爱。

有次,郁达夫跟王映霞吵架后,重新思及孙荃的好,跑回来跟她重归于好。见他回来,她依旧用家乡的美地关怀他,派人到娘家竹园里挖掘了还没露尖的春笋“土里黄”,用来炒酸菜和肉丝,这是郁达夫的最爱。但关于爱情,孙荃断然拒绝了。郁达夫走的那天,孙荃带着孩子们将他送至码头,直到帆船远去。

后来,郁达夫越走越远,到南洋娶了何丽有为妻,当郁达夫海外遇刺的消息传到国内,孙荃死不相信,她拒绝了同乡为他竖纪念碑,她相信郁达夫一定会回来,直到几年后收到政府发来的烈士证书,才悲泣不止。

孙荃自与郁达夫分手后,一直单身,含辛茹苦抚养三个孩子。他只给了她六年的幸福,她却还他一世的辛劳,“他是一位好丈夫,是一位好父亲,他没有对不起我们。”

April《东方女性》